

中国经验：China's Experience:  
Diversified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 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

乔晓光 主编

董永俊 苏欢 副主编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China's Experience:  
Diversified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 中国经验： 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

乔晓光 主编

董永俊 苏欢 副主编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 / 乔晓光主编

—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480-6596-8

I. ①中… II. ①乔… III. 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国 IV. ①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70号

---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

出品人 周建森

责任编辑 吴文龙 危佩丽

书籍设计 梅家强 李倩丽 刘展  先锋设计  
PIONEER DESIGN

责任印制 谭勋

**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

ZHONGGUO JINGYAN : DUOYUANHUA DE FEIYI CHUANCHENG SHIJIAN

乔晓光 主编

董永俊 苏欢 副主编

---

出版：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编：330025

电话：0791-86566132

网址：www.jxfinearts.com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8.25

ISBN 978-7-5480-6596-8

定价：105.00元

---

谨以此书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 序言

## 绵延的实践·在时代的转折中坚守与探索

在人类生存实践中，信仰的情感和生存心理需求都和人的实践行为紧密相连，民间文化即是生存实践的文化。人的口传方式与日常传习行为，是文化活态性的基本特征。围绕着信仰需求的习俗行为构成了日常生活传统，生活中常识的意义是在日常的实践中实现的。

为生存的艺术，是民间艺术的基本功能。身与心、手与心的参与实践，成为民间艺术最基本的实践方式。民间艺术也是一种包含着社会公共性的群体行为艺术，在不同民族节日的民俗活动中，艺术的各个门类都融合在了吉祥喜庆的仪式之中。身体的表演与表达，也是约定俗成的行为符号，是有时间过程的“动态图像”。民间艺术是身心情感的表达与实现，情感功利性的追求超越了单一的物

质性，回到了生存与生命精神的基本诉求，生存与繁衍成为民间艺术经久不衰的文化主题。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信仰的力量源自生存群体内心的求祷与企盼。民谣里唱：“水有源头树有根，民歌无本句句真”，比喻的即是民间艺术来源于“心”的真切，“心”为歌的源头，“心”为手的依托，“心”又永远指向当下。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与集体意识，正是在族群之人“心”的文化认同与文化禁忌中存活延续的。文化以人为本的深层，是以族群之人的文化之“心”为本。

一个学科的实践同样如此，关于学科的梦想、信念、设想及目标，都需要通过实践的历程去探索完成。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学科的生成与发展历史，即是一部持续七十多年的独特社会实践史。

说其独特有两个原因：其一，学科的生成起因于特殊的抗战年代，延安鲁艺的办学方针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构成了学科最初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方向和价值观，这个土生土长从陕北农村和革命战争中开始实践的学科理想，始终保持着和农村、农民生活的紧密联系，保持着对民间艺术的田野采风和艺术创作的借鉴，“延安木刻艺术”即是这条道路上艺术实践的经典；其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每在时代转折的时候，这个学科的实践者总是以自身的敏感与坚定的信念，随时代去行动、去发出声音，坚持敬畏和认同中国多民族乡村民间艺术的文化价值，坚持不懈地把这个传统引入中国美术教育。新世纪以来，开拓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学科，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做贡献，成为学科发展的文化信念。

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的学科信念，始终秉承着前辈开创的文化价值观，立足于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所创造的民间艺术，认同和倡导文化人民性的价值观，尊重并推崇民间艺术的生命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贡献。回顾学科七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源于革命文艺传统的学科思想史中，一直贯穿着“文化人民性”这条坚韧顽强的思想主线，这条主线把学院和村庄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把艺术与生活连在了一起，把艺术的信念与本土本原的文化连在了一起。

《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这本书的编撰宗旨，即在把近四十年民间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社会实践个案梳理出来，其中也包括了中央美院民间美术学科发展的七十多年历史。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民间美术传统，几乎涵盖了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多民族生存的历史即是一部心手造物的历史，也是一部多彩丰富的民族民间艺术史。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民间美术研究的专业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发展规模小，学术队伍建设滞后，专业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年轻一代研究者后继乏人，这些都是民间美术学科领域弱势现状的成因，这与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求是极不相称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早的民间文化研究是从民俗学、民间文学开始的，这是后来影响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主体文化类型，同时期开始的还有关于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大的时代转折期，一方面是时代的动荡和国家面临列强入侵的危机；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思潮与学术的传入，这些都影响了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对民族艺术的田野关注和研究。

总体讲，中国多民族的民间美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领域，虽然这个领域规模不大，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民间艺术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有了比较大的普及与发展，这从各类项目成果、展览与出版书籍的实践中可见一斑。但这些都与类型众多的民族民间美术文化物种，需要抢救、发掘、整理与研究的现实相比，还相差得很远。尤其是建立在严谨田野基础上的民间美术研究，以及深入到民族社区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仍十分欠缺和有待提高。实际上，现实还存

在更多的问题有待我们发现、发掘，并在实践中去解决。目前仍有一些民族民间美术类型的研究还是空白，其背后独特的文化内涵我们还不知道。

2016年，我们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中心委托项目，希望把我们所从事的非遗与民间美术的课程实践经验总结梳理出来。我们总结了学科史，总结了参与和支持的社会项目，以及我们认为有实践范式意义的其他项目。新世纪初以来，文化部在国家非遗四级名录体制内，不断推出新的保护理念，从非遗原生文化形态保护到生产式传承，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国家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大众熟悉的文化事项。2015年3月，文化部启动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试点工作是从中央美院开始的，经过四期的试点培训工作，中央美院非遗中心已实践总结出一整套完整的培训经验，以及面对社区非遗传承保护与可持续的文化实践理念，这些经验和文化理念的一些内容被写入国家非遗培训计划中，我们也把中央美院的培训经验总结收录在本书中。

目前，中国正处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承载着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农村社区，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如何传承和可持续性发展下去，成为一个艰难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农村生活的变化与民俗文化的淡化衰退，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这些都使文化传承受到极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昔日农村日常生活的民俗文化心理在改变，推动民俗文化传统的内驱力衰弱下来，高龄非遗传承人群

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实践中被忽视和边缘化，一个自发性文化传承的时代正在结束和转型。受现代城市化影响，农民新的生活需求和文化消费在增强。年轻一代农民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城镇生活的新一代，土地与乡愁已不再成为新一代农民的生存归属。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深刻的影响了乡村的年轻一代，这也是开放社会的必然。以往“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思维，已经应对不了当下社会化非遗传承复杂浑沌的现实，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照搬，一切在实践与探索中。

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思考当下非遗的现状，我们发现传统衰弱了但依然存在，而生活本身也在滋生出自身的“现代性”问题。生活的日常性在时间意识上是复合、混生的，隐含着动态的流变性与不确定性，也隐含着模糊的历史性。因此，我们更倡导通过田野调查和有探索性的实践，去发现寻找可持续传承的途径，去发现生活内在活力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鲁艺时期，中央美院的先辈们就开始了借鉴民间剪纸，创作新窗花、新剪纸和新艺术的实践。著名诗人艾青在1949年出版的《西北剪纸集》序言中，就谈到了民间剪纸和现代生活结合的可能，也谈到了延安鲁艺时期，木刻家力群和农家女合作新剪纸的事情，谈到了古元、陈叔亮、孟化风、夏风、罗工柳创作表现边区人民新生活窗花的事情。看到表现自己生活的新窗花贴在窗户上，老百姓也非常喜欢。1943至1946年延安鲁艺时期，江丰实践民间剪纸采风，提出在延安鲁艺开设剪纸窗花课和民间年画课，倡导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引进学院课堂。今天，我们

编撰《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一书，似乎又看到了学习践行民间美术的先辈们，看到了他们在生活中为农民创作新窗花的一幕。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在中央美院向民间艺术致敬、坚持乡村民间采风的传统经久不衰。

关于《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这本书的编辑体例，我们以当下最具非遗传承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的视角，梳理总结了不同领域的相关非遗实践，其中包括大学与非遗、社区非遗、少年非遗、海外非遗等4个板块。基于多视角、多领域的实践范例，我们提出了非遗传承实践的多元化命题。我们通过不同的板块选取相关的个案，以尽量呈现其事实、方法与问题。这些个案的背后关联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而时代快速的发展变化，也在不断更新拓展着实践的边界。我们不企望寻找一劳永逸的答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不断与生活 and 时代互动关联的时间过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更多的是对传统的敬畏和人文精神的关怀。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与帮助，我的博士董永俊、苏欢作为副主编，做了大量的编辑和审稿工作，江西美术出版社给予了全力的出版支持，危佩丽编辑为此书投入了大量心血。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也借此感谢那些乡村

里老一辈高龄传承人，他们的文化记忆使我们看到了活的传统。还有那些曾经在乡村常年奔波的基层文化干部，没有他们辛勤的采风发掘，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个案故事，也会缺少许多民间美术类型的发现。还有长年奔波在边疆民族社区小学、推广民族民间美术传承的谢丽芳老师和她的“蒲公英”团队，这些都为本书带来了感人的故事与经验。

21世纪是中国古老农耕文明转型的时代，许多传统的民族民间美术类型，面临着文化流变与消失的困境。今天，如何在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框架下，去实践本土文化的可持续传承，去拓展和创建适应当下文化遗产时代的专业学科，这都是亟待开展的时代课题。大学应该为国家与民族的非遗保护传承事业发挥作用，全社会应当同心协力去应对文明转型期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诸多公共性问题。当下的文化遗产时代需要有实践意义的“中国经验”，需要我们去深入社会生活和乡村社区，付诸真正的文化实践。

乔晓光

2017年国庆节写于中央美院非遗中心  
2018年3月31日百年校庆之际修改



## 绪论

##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遗产

——基于非遗社会实践与现象的观察思考

从万维网诞生到今天的自媒体时代，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现代化、城市化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全球化，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与互联网同时步入我们生活的还有文化遗产时代的到来，随着国家对非遗的重视，相继设立了国家文化遗产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展了中青年非遗传承人培训。在大众文化生活当中，“非遗”一词不再陌生，一些年轻人开始关注和体验非遗。虽然非遗已进入人们视线，但是，传统村庄的减少、农耕方式的改变让非遗的原生环境发生改变，自发性的民俗生活在发生流变、衰退甚至消亡，传统村社文化正在成为亟待保护的文化

遗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非遗现象与非遗传承难题。一方面非遗保护进入日常化，一方面非遗依赖的文化生态发生着深刻改变，传统与现代的消长，让我们思考今天该如何面对非遗的传承与实践。

互联网时代与文化遗产时代的相遇产生了一系列文化现象：文化物流、文化流变、文化融合、文化同质、文化衍生、文化功利……这些非遗传承问题的突显为非遗传承带来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非遗传承与保护实践工作的推进，非遗正在由文化自发传承转向文化自觉传承。大学非遗、社区非遗、少年非遗、海外非遗是我们所倡导的非遗传承的多元化方式，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的对偶时代，我们的思考和实践要不断的探索与开拓。

## 一、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态

在近十几年的时间中，中国进入了文化遗产时代，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人们的眼光都在逐渐向非遗聚焦，关于非遗的保护方案和措施不断出现。虽然国家与社会对非遗的关注度不断增加，但是非遗消失的速度远快于保护的速度，消失的根本原因是非遗所依赖的生存环境的变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自然村落在新农村建设和快速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被逐渐淹没。自1994年，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27%，与之而来的是乡村数量的急剧下降，我国的基层行政村数量从改革开放时的690388个，减少到2011年的589874个，平均每年减少2956个<sup>1</sup>。行政村递减速度尚且如此，自然村数量减少的速度可想而知，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约有90万个古村落消失<sup>2</sup>，自然村庄的消失同时意味着村落中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环境的消失。随着农耕社会生活方式相对发生的巨大改变，现代化的公路、电缆、网络让村庄与外界紧密相连，农村地区网络通讯建设的发展，也在悄无声息改变着村庄文化传统。

### （一）互联网时代非遗保护工作的历程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

昆曲列入其中，中国成为首次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19个国家之一。昆曲进入世界非遗名录，开始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被我国公众认知。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成为率先加入该条约的公约国，随即，我国对非遗保护的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同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唐卡、年画、剪纸、古村落、口头文学等一系列非遗的建档与整理工作在全国铺开。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正式下发，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非遗保护指导方针，要求各地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各级非遗工作部门相继建立。200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对国家级非遗的记录、保护、传承，传承人的认定、职责、培养以及各级管理部门的职责和管理等一系列具体行为和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办法的实施为明确我国的非遗四级保护体制工作方法指明了方向，非遗保护开始走向常态化。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通过并实施，《非遗法》是《文

1. “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基于中西部五省的实证调查》，《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4期

2. 冯骥才：《失去古村落的速度从没这么快》，《文汇报》，2015年3月11日

物保护法》颁布后近30年来,我国在文化领域的又一部重要法律,以法律的形式保护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赋予缔约国的重要职责。这部法建立在我国对非遗保护进行探索的基础之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而制定。《非遗法》的出台将非遗保护工作正式纳入到国家法律体系,使非遗保护具有了法律效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sup>3</sup>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成为热词,再次引起社会对非遗的关注,杰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频繁登上代表工匠精神的人物榜。

在相关文件颁布和非遗保护的四级体制建立后,我国开展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非遗保护工作。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国务院分别公布了我国第一至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共计1219项,其间另有省级非遗名录8786项,地市级非遗名录18186项,县级非遗名录53776项<sup>4</sup>,共计8万余项,同时伴随着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和相关活动的开展。

以上数字让我们看到我国丰富的非遗资源,也代表着各级管理部门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出的切实努力。文化遗产时代已经到来,非遗保护工作已经步入常态化轨道,非遗技能比赛不断,传承人被频繁邀请参加表演,有的传承人开起了非遗工作室或合作社,中小学校将地方非遗纳入校园活动……非

遗管理工作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保护工作的成效,同时,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管理机制的问题也越发突出,如专项资金短缺、非遗传承人评选制度疏漏等。

## (二) 互联网时代的乡村生活变化

90年代初万维网在美国诞生,随即传播到世界各国,也来到了中国。互联网作为与蒸汽机相提并论的伟大发明,这张无形的大网让世界各地可以跨越时空交汇,它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非遗依存的乡村生活。

网络刚诞生之际,全球的互联网用户为20万,20年后,全球拥有30亿网民。一个微博网站一天发出的信息量相当于《纽约时报》60年的信息量;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一天上传的视频可以连续播放98年。海量的信息充斥在我们身边,互联网无时无刻不在惠及和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为改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销售方式带来了福音。

90年代初,我国对农村地区实施了“村村通”<sup>5</sup>工程,在实现了绝大多数的公路、电力、自来水、电话网络的通畅后,“村村通网络资讯”工程发起,这项工程要让每一个村庄接通网络,让农民像市民一样获得便捷丰富的咨询。截至2006年,我国97.6%的村庄安装了电话,57.4%的村子安装了有线电视或网络。<sup>6</sup>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保持稳定增长,截至2015年12月,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7%,中国农村网民数量达1.95亿,占我国全

3. 蔡武:《〈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日报》,2011年3月2日

4. 叶鹏:《基于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及实现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8页

5. “村村通”即“村通工程”,是国家对农村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进行的大规模改造项目

6. 张赤东:《实施“村村通网络咨询工程”,加速科技兴农步伐——以信息化推动农村建设的思路》,《科技论坛》,2011年2期

体网民的 26.9%。手机制造商专门在农村地区推出 160-800 元的低价手机，手机上网成为带动农村地区网民增长的主要动力<sup>7</sup>。

乡村中使用网络的大部分人是接受过基础教育、会操作电脑的年轻人，年轻一代传承人和城市中年人的信息生活无异，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盯着手机。传承人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络平台，传承人的作品可能迅速被为数众多的网民受众欣赏到，网络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展示舞台。年轻的传承人可以通过一部手机结识热爱非遗的海外客户，并把作品卖到国外，更有很多年轻人用便利的网络开起线上商店，销售作品。除了销售作品、自我宣传，网络也是传承人获取非遗咨询、接收文化部门工作通知的主要方式。

虽然网络社交平台方便了传承人获取通知，互联网让传承人开阔眼界、熟悉专业领域，但是，新兴的网络方式的快速发展对于非遗传承也暴露出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在这种网络普及的情况下，那些不会使用互联网的老一辈传承人逐渐脱离活跃的传承场域而处于封闭的状态，信息获取与社会交流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促进底蕴深厚的老一辈传承人的文化传递与发展。

### （三）互联网时代的农民迁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任务需求大量的劳动力，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农民的移动，也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结构，改变了乡村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社会生态，非遗传承的原生环境发生了改变。

80 年代开始的“农民工潮”是我国建国以来继“大跃进”“上山下乡”后的第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这次人口迁徙的数量远大于前两次。大跃进时期人口迁徙数量大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4.5%，上山下乡时期的人口流动数量约占总人口的 2%<sup>8</sup>，而在 2005 年，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为 1.4 亿，<sup>9</sup> 占总人口的 11%。这一数据在 2015 年的统计中再次被刷新，此时我国的农民工人口数量为 2.7 亿，<sup>10</sup> 乡村人口数有 6 亿，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农民都在城镇谋生。相比前两次国家行为的人口迁徙，第三次由市场经济引起的农民主动自发式的人口移动，数量规模更大，方向更为多元和分散。

青年人对城市充满向往，他们是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改变乡村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2004 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29 岁，30 岁以内的农民工占到总数的 61%。<sup>11</sup> 城市中的农民工快速融入新生活、接触新事物，他们用电话、网络与

7.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时间：2016 年 8 月 3 日

8. 数据参考杨黎源：《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比较及启示》，《探索》，2007 年 3 期

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0603/t20060316\\_30326.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0603/t20060316_30326.html)

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11. 国务院研究室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 4 月，第 71 页

家乡亲人联系，将城市生活方式与理念快速传递到乡村，更直接的影响来自年轻人的定期返乡，他们将城市里的服饰、信息、生活习惯甚至互联网直接带到乡村，让更多的村民认识外面的世界。

长期的城市生活不得不让年轻人放弃乡村里的信仰和民俗，只有重要节日或活动时回乡，这些民俗对年轻人来说遥远而陌生，有的年轻人用手机拍摄照片、视频上传到网络，原本的参与者成为游客般的旁观者；也有部分年轻人对“新鲜”的乡村民俗产生兴趣，更加喜欢乡村传统的民俗方式，并模仿长辈的样子学习、体验传统民俗，可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要投身到忙碌的城市生活中。

年轻的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巨大数量的农民迁移对传统民俗的改变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让乡村中的农民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形成乡村与城市沟通的循环往复，乡村生活和传统民俗在循环中逐渐弱化。现在的乡村缺乏年轻活力，民俗活动的组织只能靠老一辈支撑、维持，非遗的存在环境、生存状态在农民的迁徙中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 二、互联网时代的非遗传承现象

丰富的信息资源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为传承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利于非遗普及和宣传。同时，传承人对互联网的接受也改变了非遗的传统形态和传承人的传承状态，非遗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文化现象相继产生，这让非遗传承实践面对不同于以往的挑战。

### （一）文化物流

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是为人们快捷地提供信息资源，这一特征产生了非遗时代的“文化物流”现象，即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非遗类型、文化符号甚至民俗从源地流通到其他地区展示、销售或表演。

产生文化物流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为因素的引导，也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尤其是互联网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互联网的普及也将各地的非遗资源呈现到传承人眼前，无时无刻不在激发传承人的创作欲望。传承人在创作前期以个人审美倾向选择参考图像，在不顾忌地域特色的情况下，无意地将外地的非遗“物流”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我们常常可以在传承人新创作的作品中看到非本地区的图像来源。一个地区的传统工艺品中受欢迎的图像，也有可能正被输送到其他城市，出现在另一位异地非遗传承人的作品中。

近几年，博览会成为非遗传承人传承活动和提高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频繁的博览会也是造成文化物流现象的原因。传承人通过组织推荐或网络在第一时间获得展会或展览信息，之后便带着他们的各式作品奔赴展场，甚至有的传承人带着作品参加海外会展活动。展会为传承人提供了销售作品的良好契机，全国各地的各种门类的非遗产品在同一时间集中在同一场所展示，观众可以任意挑选、购买喜欢的作品或产品。

对于参会传承人来说，博览会为大家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而这种“学习”经常会出现图样借鉴的情况，传承人相互参考，竞相模仿销售较好的产品或样式。因此我们可能会在传统北方神码的摊

位上发现东南沿海风格的年画，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剪纸的摊位上发现陕北地区的剪纸花样风格，甚至外国风格的剪纸也“流通”到了中国传承人的作品当中。对于消费者而言，全国的非遗类型集中展出为他们提供多样的消费选择，但是对作品的民俗内涵，消费者并不理解，甚至不知道名称，博览会上的文化物流，让非遗作品的地域性含义消解，成为单纯摆放在家中的工艺品。

## （二）文化同质

文化物流现象催生出文化同质化问题。互联网、博览会、农民迁徙等事件直接改变了非遗的传承方式，使原本在我国广泛分布多样的非遗类型，出现作品同质化的现象。传统的传承方式是在前辈的指导下学习技艺，既有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传承，也有作坊中的师徒传承。在乡村生活中，传承人自觉积累与非遗相关的民俗文化知识，由此构成非遗传承“技艺”和“记忆”的双重知识体系。今天的非遗传承除了师父的言传身教，网络成为年轻传承人离不开的学习方式，非遗传承人可在互联网上查阅任何有关非遗的资讯。多元化的知识让传承人开阔了眼界，对于丰富知识体系固然有益，但是，如果传承人没有坚定的立场与辨别能力，所谓的学习就成了不加分辨地“搬运”。尤其对于传统手工艺领域的传承人，网络图像对作品的影响更为直接，很多中青年传承人都有通过在网络上寻找图像资源而获得创作灵感的经历。

在传统手工艺领域，传承人在作品中“嫁接”网络资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传承人将其他地

域或领域中的非遗图像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两个远隔千里的艺术风格出现在同一件作品上；第二种是将网络上的风景、名胜等图片转化到自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名胜古迹在不同的非遗类型中不断出现。以上这两种现象直接导致非遗失去地域性文化特征。还有一类是将古今中外的著名画作用不同类型非遗表现，力求逼真，这使传统民间工艺出现模仿名画的趋势。便捷的图像搜索使非遗创作脱离自身传统，出现了模仿或抄袭流行图像的现象，多方位的“文化融合”造成的共同结果是让全国各地的非遗面貌出现同质化的倾向。

传承人将网络上的图像资源或制作方法嫁接到自身的非遗创作中，改变了传统非遗作品的面貌。长此以往，外来的风格被频繁使用，非遗原生地的传统作品却被弃之如敝屣，非遗的地域特征淡化。在2015年“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剪纸交流展示活动中，我们看到来自全国27个“剪纸文化之乡”的非遗传承人的剪纸创作中，很多作品有相似的创作主题以及相近的语言风格，一些作品几乎无法从图像与风格上区分地区。

## （三）文化流变

无论古今，文化流变是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今天，我国文化流变的速度在逐步增快，外力的冲击因素也更为突出，我们对文化抢救、记录、研究的速度赶不上流变的速度。互联网信息、农民的迁移都在对文化流变产生影响，文化物流引起的文化同质等问题本身就是非遗传承中的流变现象。另外，由于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

变,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类的非遗变化更为显著。传承人对非遗的传承情况也在发生流变。老一辈传承人在传承上具有技艺与记忆的双重知识体系,但是在今天,年轻一代的传承人对记忆层面的文化继承越来越少,单一的技艺学习让非遗传承的完整性缺失。例如,传统陕北剪纸的很多纹样是使用在巫俗当中的,比如,“娃娃”纹样根据形态变化而有不同的祈求功能:“扫天婆”挂在院中为了求晴免涝,“瓜子娃娃”贴在门上为了辟邪挡鬼,“碰头娃娃”贴在院子水缸上以祈天降雨……现在人们很少再剪娃娃许愿,失去了民俗实用价值的剪纸演变为图案纹样运用在剪纸创作当中,在制作目的、使用方法、悬挂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流变。

很多传承人出生并成长在乡村,成年后搬到城镇生活与工作,即使掌握传统民俗,在城市生活中也难以复现。农民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发生改变,原本生长、熟悉的乡村只有在节日时得以回乡小住,“旅游观光式”的短暂停留让年轻人失去学习民俗的基本条件。新一代人对非遗产生“文化陌生感”,乡村的民俗、信仰失去年轻一代的传承群体,传统习俗不再,非遗的原生环境不再,年轻人传承继承的更多是技艺。

#### (四) 非遗的“新”功利

传统乡村民俗仪式中使用的民工艺品往往具有象征性的民俗或信仰功能,是在特定时空下地区性群体共通的文化物象,所以,非遗类型本具有“文化功利性”,往往蕴含相对稳定的主题内涵,比如求子长寿、招财纳福、驱邪禳灾是民间美术类非遗

的重要表现寓意,我们熟悉的年画、剪纸、面具、银饰、刺绣、建筑彩画等纹样都以此为功利性目的,并在民间信仰、民俗仪式、生活用品三个层面的使用中发挥其象征性与审美性的价值。功利性驱使着这些非遗类型被使用、传承,功利性是非遗在原生环境中得以传承的根本动力。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科学知识被广泛普及,解决问题的渠道不再单一,即便是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生活习惯也越来越接近城市。很多非遗项目失去了原有功利性的传承动力,延续便成为难题。

我们国家已经迎来文化遗产时代,非遗传承人的评选成为刺激传承的新动力,这是新时代促生的“功利性”。一些传承人从县一级开始层层向上申报,努力取得更高级别的传承人身份,这条途径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荣誉、渠道、机会以及更高的展示平台,其作品的价值也将逐步提升,传承人认定机制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非遗传承人评选本身为传承、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设立,在个别地区这些利益往往又与非遗传承人评选的初衷相违背,非遗传承人成为人们争夺的荣誉,往往会制造出一系列人事矛盾,在基层非遗传承人评选工作中,真正技艺优秀的传承人难以上榜、弄虚作假现象时有发生。

纵观当下非遗事业发展现状,一些传承人的作品已经脱离民俗生活,非遗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应该思考非遗传承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功利”,在接纳现代文化的语境下根据传承的文化生态、传承人的传承心理而创造新的文化功

利，用新的文化功利价值连接传统与当下。这种功利性不能是单纯的经济利益，不能是项目化的利益刺激，应该基于文化功利的探寻与引导，使非遗回归到日常化的生活当中。

### 三、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关联着多民族文化的社区生活，非遗的文化传播不能仅仅在体制内进行项目保护，更应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生态中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尤其应注重不同非遗类型在原生地日常生活中的传承实践，这是非遗文化物种保护和可持续存留的基础。今天，进入文明转型期的中国，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发展，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应该探索多元化的非遗传承途径，学校教育 is 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教育介入非遗传承将成为新趋向，涉及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也涉及高校与社区的互动，步入互联网时代，非遗将进入多方位探索实践的传承发展阶段。

#### （一）大学与非遗

2015年11月，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全国57所高校展开，这成为大学教育和社区非遗文化传承发生关联的契机，培训也让我们在实践中探索解决互联网时代非遗传承的诸多问题。

大学代表着主流文化的知识体系，也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领域上的认知、研究与创造的能力。大学与民间的结缘在20世纪初业

已开始，从“新文化运动”时北京大学发起的民间歌谣采集与民间风俗调查运动，到“延安鲁艺”时期青年革命艺术家对民间文化的考察借鉴，再到建国后艺术院校对民间美术的学科设立与探索，直至21世纪初高校所承担的申报世界非遗、非遗保护抢救、非遗政策研究等工作，大学成为实践探索、研究并解决非遗问题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将大学与非遗的互动传统进一步发扬，不仅让高校直接参与到非遗传承保护的行列，也为高校师生与社区传人的教学相长提供了交流平台。

中央美术学院有着重视民间美术教育的传统。50年代中央美院成立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等工作室；80年代中央美院成立了民间美术系，邀请陕北“剪花娘子”到学院讲学；进入新世纪，中央美院成为较早开展非遗教育的高校，成立了国内首家非遗研究中心。中央美院作为最早开始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院校，在培训过程中结合多年教学和研究经验，探索出“三知”“三化”的培训经验。三知理念提倡“让传承更加传统”，让传人深刻认识到传承传统的深刻意义。面对非遗依附的社区文化生态在互联网时代的深刻变化，我们倡导非遗传承从“文化自发”走向“文化自觉”，为社区非遗传承的可持续寻找存活与发展的新方式。三化的理念让非遗培训更加贴近社区传承实际情况，让培训进入日常化，让传承更加靠近非遗的活态本质。中央美术学院的研培理念，即倡导“培训让传承更



加传统”，新时代的非遗发展在于“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三知与三化培训理念的提出是大学参与文化部传承人培训工作中的实践探索，也是高校对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一系列非遗问题提出的应对方案。

大学与社区非遗传承的关联与互动是亚太地区高校已经开始的社会实践课题。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遗产大国，但高校的文化遗产专业发展与社会需求是不匹配的，中国高校在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学科建设方面是滞后的。文化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作为知识体系应有的文化尊重还没有完全实现，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体系的接受还没有真正开始。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与科研方面滞后的现状，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带来了被动的局面，基层社区文化遗产传承问题的解决以及相关濒危文化遗产类型的抢救与基础研究，都有待大学的积极介入，并承担起当下文明转型期应有的文化使命。后续几年的研培工作也是大学发展非遗相关专业学科的机会。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行中，许多乡村消失了，以生活为载体的许多文化遗产也随之消失。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能顺利传下来，但是具有文化艺术独特价值的非遗类型可以进入教育传承的渠道中。在中国这样的文化遗产大国，教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存留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途径。大学不仅是非遗的教育传承之地，也可以成为有当代价值的非遗文化物种的“活态博物馆”，

如：剪纸、造纸术、木版雕版术、活字印刷术、印染、陶瓷、民间建筑营造等许多非遗手工艺传统，都可以成为大学新的知识资源和实践的文化艺术类型的课程。尤其是文化遗产地的高校，非遗传承社区的双向互动与交流学习是非遗传承不可忽视的可持续模式，文化部开展的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研培工作为这个目标带来了机遇与可能。

## （二）社区非遗

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文化现象涉及方方面面，解决文明转型期的非遗传承问题需要探索多元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方法进行全方位的传承实践。

多民族社区非遗活态文化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的根基，乡村社区是区域文化发展的精神情感之源，是非遗赖以生存的土壤，传承实践的过程尤其要关注社区群体。中央美院首开前往传承人社区进行回访式调查的工作模式，回访是融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于一体的社区非遗实践方式，这个方式也在研培工作中传给了其他培训高校。回访让参与调研的大学生进入社区中认知非遗传承与保护现状，青年大学生从传承人身上学习与体悟到工匠精神、传承品质、非遗技艺，并运用与转化到自身的艺术创作中；传承人也会将自己难以实现的创作想法与大学生探讨，合作完成创新创意作品，形成互动互惠的艺术碰撞。此外，中央美术学院还在剑川、贵州等少数民族乡村社区设立实践教学基地，让大学生直接进入社区学习非遗技艺，并在教学基地开展“艺术介入乡村”的社会实践。

高校对社区非遗的参与，旨在大学与社区之间